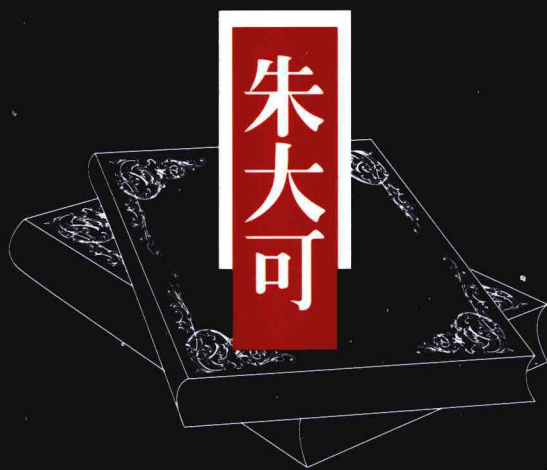


审判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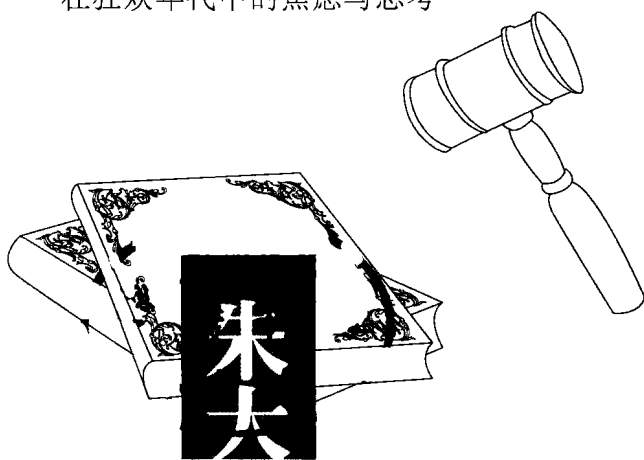
朱大可
在狂欢年代中的焦虑与思考



東方出版社

审判

朱大可
在狂欢年代中的焦虑与思考



—

東方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审判 / 朱大可 著 — 北京: 东方出版社, 2012. 10

ISBN 978-7-5060-5524-6

I ①审 II ①朱 III ①文艺评论-文集 IV ①I06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247306 号



审判
(SHENPAN)

作者·朱大可

责任编辑·黄晓王 史亮

出版·东方出版社

发行·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

地址·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

邮政编码·100706

印刷·北京智力达印刷有限公司

版次·2013 年 1 月第 1 版

印次·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·1—8 000 册

开本·71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

印张·14

字数·180 千字

书号·ISBN 978-7-5060-5524-6

定价·36.00 元

发行电话 (010) 65210056 65210057 65210061

版权所有, 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拨打电话: (010) 65210004



001 \ 孤独的背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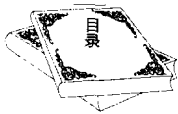
在全球娱乐时代，孤独的先知早已丧失了“逗你玩”的功能。而这正是思想和文学的最大悲剧。和文学一起中风，并死于人类狂欢的午夜，便是难逃的宿命。

- 003 \ 加缪：荒谬而勇敢的西西弗
- 010 \ 贝克特：一个被等待的戈多
- 019 \ 马尔克斯：百年孤独之外的喧嚣
- 028 \ 索尔仁尼琴：古拉格的叛徒与先知
- 032 \ 施蛰存：蛰伏中的独立与高洁
- 035 \ 张爱玲：优雅小资的造魅与去魅
- 039 \ 郑念：向高贵而坚硬的灵魂致敬

043 \ 迷离的光影

一方面卑贱和软弱，一方面却伟大而坚硬。葵的这种两重性，正是中国艺术家、知识分子，乃至整个国民的象征。

- 045 \ 《无极》：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
- 049 \ “十三钗”：情色爱国主义的高音
- 053 \ 《色·戒》：身体叙事的失败者
- 056 \ 记忆之白、红、灰——周海婴的镜匣人生
- 060 \ 强光的暴行——解读蒋志“光系列”叙事
- 066 \ 向日葵与太阳的对白
- 069 \ 微笑的蒙娜丽莎密码



073 \ 变乱的词语

“陸”的叠土形被改为“击”而成“陆”；“愛”字惨遭剜“心”之痛，这些都成了社会的深刻讖语。简体汉字犹如精密的预言，预见社会道德状态的剧变。

075 \ 转型中国的三大文化隐喻

078 \ 丢失的汉字密码

081 \ 断裂的汉字精神

085 \ 大话革命和小资复兴

095 \ 秽语爆炸和文化英雄

098 \ 汉字新创和词语变乱

106 \ 人本主义和书法对抗

111 \ 坍塌的废墟

指望中国文学能够独自摆脱这场退化噩梦，无异于扯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大地。年轻化只能拯救阅读市场，却不能拯救文学本身。

113 \ 文化退化与文学断代

116 \ 1978—2008，中国文学蜡像馆巡礼

126 \ 诗歌麻将的N种玩法

131 \ 意见社会的文学丑角

135 \ 文学的衰微和蝶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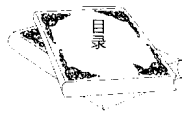
142 \ 忏悔与救赎——中国文坛的道德清洗运动

145 \ 忧郁的批评——关于文学批判的精神分析

149 \ 天鹅绒审判和诺贝尔主义的终结

157 \ 破碎的面具

我们正处于文化危机的焦虑中，我们守望着文化的最后领地，我们正在为文化的修复而呐喊，我们的工作沉重而艰难。文



化复苏,从每个人独立的反思开始。

159 \ 中国文化二十年撒娇史鉴

166 \ 从通俗到丑俗的历史流变

171 \ 2005, 中国文化的全新牌局

177 \ “文化大师”的修炼与塑造

180 \ 《云南映象》与杨丽萍悖论

183 \ 扇动的翅膀

在完成最后一张黑白木刻的时候,你会看到色彩。但这不是世俗的五彩,而是世界的原色。

185 \ 走出思想的童谣

190 \ 民族国家的镜子和工艺

193 \ 时间法则下的集体肖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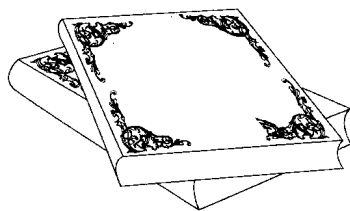
196 \ 剧痛的言说

199 \ 越过女性主义的感官视界

203 \ 木刻的黑白使命

206 \ 大众文化批评挺进娱乐元年

211 \ 跋



孤独的背影

在全球娱乐时代，孤独的先知早已丧失了“逗你玩”的功能。而这正是思想和文学的最大悲剧。和文学一起中风，并死于人类狂欢的午夜，便是难逃的宿命。



加缪：荒谬而勇敢的西西弗

人们热衷于把加缪与萨特相提并论，称其为存在主义的两大思想导师。当加缪在埃菲尔铁塔下突遇车祸死去后，萨特的恋人西蒙·波伏娃在巴黎的围墙下通宵徘徊，悲痛得难以入眠，但萨特却公开表露出对加缪的轻蔑，认为加缪不过是一个文体家而已。这一方面暴露出萨特的狭隘性格，另一方面也揭示了加缪对于文学的卓越贡献——他完成了现代法语的伟大书写，并且因为这种书写而提升了法语的魅力。

不仅如此，还因为杜小真这样的杰出译者，加缪话语的魅力获得了微妙的传达，并对现代汉语的建构产生了不可思议的影响。在这个意义上，译者的贡献有时甚至可以与原作者相提并论。除了杜小真翻译的加缪文论，其他对中国外文学产生重大影响的文本，分别是王央乐翻译的《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选》（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）和马尔克斯《百年孤独》（有多种译本）等。这些杰出的译本，构成了中国先锋文学自我进化的范本。



中国作家的加缪崇拜

“加缪-杜小真”语体首先影响了先锋小说家的书写。李劫在《中国八十年代文学备忘》一文中指出：“最早进入中国的20世纪现代派文学，不是后来风靡的马尔克斯和博尔赫斯，而是卡夫卡和加缪等人。”作家孙甘露在《此地是故乡》中回忆道：“我依稀记得那个下午，工间休息时，坐在邮局的折叠椅上读加缪的书……在窗外电车导流杆与电线的磨擦声中，我隐约获得了对上海的认识，一份在声音版图上不断延伸、不断修改的速写。”20年后，在2003年“非典”大流行期间，孙甘露在《当你咳嗽读什么》一文里，依旧在不倦地劝说读者返回加缪的世界：“伟大的加缪，通过鼠疫发现世界之荒谬，而时髦的人则通过瘟疫发现时髦。”

作家格非在颂扬鲁迅的遗产的同时也宣称，在“鲁迅和加缪、卡夫卡之间是有可比性的。”马原在谈到加缪小说《局外人》的技巧时说：“整个小说，加缪写得冷静至极，从始至终不显露出一丝激动情绪。语言丝毫不露声色，多用短句，几乎看不出人物的思考，甚至有些罗嗦，但所有的细节都有意义——始终都是绝对的冷静与克制，将读者的情感和情绪控制得牢牢的，简直密不透风。”（《阅读大师》）这是中国小说家在其书写实验中获得印象，它远远超越了翻译家和学者的干枯理解，散发出形而下经验的浓郁气息。

加缪、马尔克斯、里尔克、卡尔维诺、海明威和米兰·昆德拉一起，构成了中国文学自我改造的话语套餐，为文坛留下了智

性叙述和文体革命的线索。在许多先锋小说的文本里，时常会闪烁出加缪的句子，它们犹如被坚硬的文化壁垒所碾碎的贝壳，标示着加缪东行的细微踪迹。

但可以断言，加缪对中国的影响仅限于他的文体。他的哲学和美学只是经院学者们的研究对象，并未真正融入中国知识分子的灵魂，成为精神生活的秘密指南。存在主义曾经在20世纪80年代风靡一时，但它更像是一种知识标签，贴在新生代知识者的额头，俨然是自我炫耀的时髦事物。正因为如此，它像其他风尚用品一样转瞬即逝，在1989年之后便烟消云散。它甚至没有构成一种基本的精神疗法，为辗转反侧的人们解除令人绝望的痛楚。

由罗洛·梅确立的存在主义疗法，是建立在承认生活荒谬性的基础上的，所以它又被称为“意义疗法”。它认为做人的根本目标就是寻找意义，并借助生活中的苦难来发现意义。存在主义试图告诉我们，有时候，我们的全部生活，如同一句废话那样伟大而重要。正如尼采所说，知道为什么而活的人，可以忍受几乎任何怎样活的方式。

存在主义天生就有治疗解除失调性焦虑的机能。早在1985年，我就利用存在主义的荒谬原理，成功地说服一位朋友放弃自杀的决定，他也从那时起成了“积极生活的人”。然而，就宏观图景而言，存在主义并未成为后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药物。恰恰相反，在那个年代，出现了严重的死亡（自杀）多米诺骨牌效应。那些曾经大量反复阅读过加缪和萨特的绝望者，选择了激越的死亡方式。从诗人海子、戈麦、顾城、方向，到青年批评家胡河清和报告文学作家徐迟等，这条黑色的死亡链，是中国存在主义时尚的一个反证：20世纪80年代存在主义在中国的传播，只是一场表面的文化喧闹，它完全没有渗入中国知识分子的灵魂。被忧郁气质笼罩的中国知识界，丧失了利用加缪进行自



我精神拯救的契机。后来存在主义从中国舞台上的蒸发，再次验证了我的这种断言。

加缪美学的亚细亚式误读

加缪的生命美学被最原始的二值逻辑所笼罩，流露出古老神学教义的单纯气质。在加缪的陈述中，人与他置身其中的世界、反与正、光明与黑暗、皈依与反叛、希望与绝望、秩序与动乱、理性与激情、憎恨与热爱，等等，所有这些对立的元素互相对位和反错，纠缠在同一个陈述句里，形成奇异的圣经式的张力。“这茫茫黑夜就是我的光明”，“他就是灵魂的走头无路的过客”，“死亡是最终的放纵”，“以最悲怆的声音引出的希望”，“这无泪的充实，这充满我身的没有快乐的和平”……这些彼此冲突的语词被镶嵌在同一个语句里，展开近距离的肉搏，迫使其产生最饱满扩张的语效。这是内在对抗的教义，但它却根植于语词的深部，犹如从岩石裂缝深处升起并紧密纠缠的藤蔓。

加缪是擅长利用话语表层语词冲突的大师。他的革命性修辞制造了出乎意料的“二元式反讽”，但这种反讽并未损害其表述的决断性，相反，令他的哲学叙事展现出某种罕见的力度。不仅如此，在这种对立物的彼此缠绕中，他自身的精神分裂得到了医治。与萨特截然不同的是，加缪更具神学家气质，他像一个反面的先知，喊出了关于人生和世界的荒谬真理。

尽管加缪的灵魂阻止了与荒谬世界的破裂，但他的肉体却未能幸免于难。他被飞驰的汽车撞死，这显然是外部世界一次严酷的谋杀，它实施了跟这个孤寂灵魂的最后决裂。车祸是一个

惊心动魄的仪式。是的，人与其置身其中的世界的疏离不可避免。加缪号召我们带着这种疏离去生活，但他本人却无法超越大破裂的命运。存在的荒谬性就在于，世界还是以最激烈的方式，撕毁了与哲学家共存的契约。

作家马原在解读加缪的《局外人》时宣称，他发现了加缪的秘密，那就是他对其自身的冷漠。加缪死于车祸，他如果就是《局外人》里的那个男主角，一定会觉得这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事件。马原声称，海明威和这个世界硬碰硬，而加缪则放弃了一切抵抗。在我看来，这是一次典型的文化误读，马原掌握的所谓加缪的“不抵抗哲学”，恰恰就是加缪所要竭力抵抗的事物。这种彻底的价值倒置，再度向我们展露了“文化交流”的荒谬性。

加缪的女儿卡特琳娜·加缪，在接受英国记者威尔金森专访时指出：“局外人不是加缪，但在《局外人》中却有加缪的某些特征，有那种被放逐的印记……他从知识分子圈子里被放逐。那是一种彻底的放逐。仅仅是因为他的感性先于理性的思考方式。”毫无疑问，《局外人》是加缪孤寂性的隐喻式叙写，它跟加缪对自身的冷漠毫无关系。

然而，跟马原的误读相比，西西弗在中国的语义转换，无疑是更富于戏剧性的事件。加缪继承了荷马史诗的叙事传统，确认西西弗因背叛诸神而接受推石上山的永久性惩罚。加缪宣称，西西弗是“进行无效劳役而又进行反叛的无产者”，加缪的存在主义解读，旨在借助这个古老的符号，揭发“荒谬”状态的诸多意义，并号召我们接受这个伟大的宿命。

奇怪的是，在向中国历史传输过程中，西西弗却没有把中国人引向加缪式的哲思，而是发生了诡异的自我美学变脸，悄然转型为勤劳善良的牛郎董永。这场语义变乱起源于南中国海的风暴。南宋、元和明永乐年间，沿循海上丝绸之路，大批波斯人、阿拉伯人、犹太人和北欧人在中国东南沿岸登陆，向当地船夫、



商人和普通居民倾销本族文化，但似乎只有少数希腊神话被纳入了中国神谱，成为一种经久不息的信仰。

在闽南和台湾的七星庙里，至今仍然供奉着作为儿童守护神的“七星娘娘”（又称七星妈、七星夫人、七娘妈和七娘夫人）。这其实就是西方天文学的“七姐妹星团”（一组属于金牛座的蓝色恒星，在中国天文学体系里称“昴星团”），在希腊神话中叫做“普勒阿得斯七姐妹”，她们是擎天大力神阿特拉斯的女儿，其中第七个女儿叫作墨罗佩，她的六位姐姐都嫁给了天神，只有她嫁给了一个有争议的凡人国王，那就是西西弗。据说她为此深感羞耻，用纱巾蒙上自己的脸庞，所以亮度最弱，肉眼很难看清她在星空上的美丽容颜。

以害羞而名垂青史的墨罗佩，正是中国“四大民间传说”中“七仙女”的原型。她嫁给凡人的事迹，跟织女嫁给牛郎的事迹相似，结果在传入中国时被世人弄混，墨罗佩成了玉帝的第七个女儿，继而被移花接木，替代“仙女”下凡，当上农夫董永的外籍妻子。

这场古怪的神话移植运动，保留了原型神话的总体叙事结构——西西弗和董永都是不倦的劳动者；并且都以凡人的身份获得天神之女的爱情，最终都在天神的干预下失去了爱妻，由此成为悲剧性婚姻的范例。但西西弗神话的美学语义，却遭到了中国民众的严重篡改。西西弗是痛苦无奈的劳役者，而董永是快乐勤劳的劳动者；西西弗是背叛者和遭人嘲笑的对象，而董永是世人颂扬的道德楷模；西西弗与妻子永久分离，而董永却赢得了一年一度（七夕）相会的权利。中国文化据此显示了强大的喜剧改造能力。

这是截然不同的生存母题，并且注定要从中诞生两种面目全非的美学：从西西弗中诞生伟大的存在主义，而从董永中长出了中国乡村社会的福乐信念。这种改造旨在消解存在的荒谬性，

并寻求人与境遇的有限和解。“西西弗-董永案”超越了文化误读和异延的寻常范围。越过董永所受到的礼赞（他是勤劳和善良的男性象征符码），我们看见了亚细亚乡村伦理消解反抗的强大力量，它足以在我们蔑视的事物面前摧毁我们。它是中国人民最坚实的道德教科书。在这一漫长的历史进程中，发生了两个彼此呼应的事件：民众获救了，而知识分子则在死去。



贝克特：一个被等待的戈多

一张布满褶皱的瘦脸和一头耸立的灰发，萨缪尔·贝克特的面孔被印在高高飘扬的旗帜上，成为2006年都柏林城的文化风景。就在他百岁诞辰之年，爱尔兰首府，那个贝克特厌倦和离弃的家园，纪念他的活动变得如火如荼，到处弥漫着这个人的乖张气息。而他跟祖国之间的嫌隙，却被媒体小心翼翼地掩饰起来。而他跟东方社会的隔阂，则遭到了更多的忽略。

脆弱的出版

以荒诞剧作家著称的塞缪尔·贝克特，其代表性剧作包括《等待戈多》、《终局》、《哑剧》（共两部）、《最后一局》、《克拉普的最后一盘磁带》、《尸骸》、《快乐时光》、《歌词和乐谱》、《卡斯康多》、《喜剧》等。他还是杰出的小说家，拥有《莫

菲》、《瓦特》、《莫洛依》、《马隆之死》和《无法称呼的人》等一些 20 世纪的小说杰作。此外，他还有一大堆等待翻译和诵读的诗歌。我们被告知，这个人诞辰 100 周年了，需要特别加以纪念和缅怀。中国人加入了这场礼节性的文化喧闹。他们对这个人一无所知，或者只满足于一些肤浅的道听途说。

回顾贝克特在中国的出版历史，是一件令人不快的事情。用百度搜索，我们可以获得 18 万个结果，其中极少部分指涉英国女外交大臣玛格丽特·贝克特，而剩下的大约 10 万个网页，跟这个叫作塞缪尔·贝克特的男人直接相关。但这个数字，只是某个明星博客点击数的千分之一，足见贝克特在中国的微弱影响。只要看一下贝克特的翻译出版状况，就会发现，即使这些数量有限的网页，也都是虚张声势的迷雾。

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，施咸荣首次把《等待戈多》当作供批判用的“内部读物”引入中国，成为面目可憎的资产阶级艺术象征。革命的逻辑高声嘲笑着荒诞的逻辑。这种意识形态气氛构筑了黑暗的布景，而贝克特以文化罪犯的身份登上了中国舞台。

经过“文革”的空白，1980 年上海译文出版社首度出版《荒诞派戏剧集》，1983 年外国文学出版社又出版了《荒诞派戏剧选》（1998 年再版），这两个选本都收录了施咸荣的《等待戈多》译本，这意味着贝克特首次以“资本主义批判者”的合法身份亮相中国。1986 年，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由袁可嘉等人选编的《外国现代派作品选》，也收录了施咸荣译的贝克特的《等待戈多》和小说《逐客自叙》（涂丽芳译）。从 20 世纪 60 年代到 21 世纪初期，在长达 40 年的岁月里，中国文学界对贝克特的认知始终停留在“等待戈多”的初级阶段。这是一种令人惊异的冷漠和无知，把贝克特的文化传播，变成了一场可笑而单调的“戈多之歌”。

在此期间，我们也看见了一些零星而低调的出版碎片。例